

从日本汉诗看古代日本贡举制度

崔 晓

内容提要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国家的养士与选士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为学者们所关注。史家对于科举之定义、内容、发展过程、意义和影响等方面亦多有探讨,以至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值得注意的是,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古代日本也曾仿照中国建立了贡举制度。尽管其施行时间与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中国,但同样有着独特的内容与发展历程。该制度的若干特点,在当时日本人所作有关贡举制度的汉诗及其他文献中均有所反映。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与中国科举制渐行渐远之原因,与两国实施贡举制度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关。

关键词 古代日本 贡举制度 日本汉诗

作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要内容,科举制不仅贯穿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而且,对整个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因此,科举制度历来为学者们所关注,有关该制度的考察与研究亦屡见不鲜。至20世纪90年代,“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被正式提出后,该学科进一步发展,以至形成专门的学会,呈现出蓬勃之势。

然而,在对古代中国、韩国以及越南等国的科举制度进行细致研究的同时,科举学学者对东亚另一个重要国家——日本所实行过的贡举制度却言之甚少。中国大陆学者一度认为日本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①甚至连不少日本学者都对此表示认同,并将科举制度与宦官、缠足并列为“中国的三大奇习”^②。只有少数研究古代中日学制的学者,例如,日本方面的桃裕行、久木幸男、多贺秋五郎与冈田正之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高明士、陈水逢与刘伯骥等人,在著作中将贡举制度作为学制的附属有所论述。^③直至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者在台湾地区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影响下,通过对有关

① 萧瑞峰《日本有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读日本汉诗献疑》,《文史知识》1995年第7期。

②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页。

③ 桃裕行《上代学制的研究》,目黑书店1947年版;久木幸男《日本古代学校的研究》,玉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多贺秋五郎《唐代教育史的研究——日本学校教育的源流》,不昧堂1953年版;冈田正之《近江奈良朝的汉文学》,养德社1946年版;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与《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学海出版社1984年版;陈水逢:《中国文化之东渐与唐代政教对日本王朝时代的影响》,中国国家图书馆蓝印本1966年版;刘伯骥《唐代政教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等。上述著述主要围绕古代日本之学制,列出专门章节对于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作了介绍与探讨。

文献的考察与分析,将日本8—11世纪短暂实行过贡举制度的史实还原出来。^①

如此一来,古代日本的贡举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制度,作为律令制国家学生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也如中国科举制般与社会的诸多方面相互关联。

在中国的《全唐诗》中,收录有反映考试场所的“梧桐叶落满庭阴,闭锁朱门试院深”^②,反映放榜场面的“喧喧车马欲朝天,人探东堂榜已悬”,以及反映及第者兴奋心情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等。有关科举方面的诗作,实际上日本亦然,在《菅家文草》、《扶桑集》等日本古代诗集同样存在着反映日本贡举制度的诗文,虽为数不多,但亦足以由此一窥日本贡举制度之原貌。以下,笔者就试从这些日本汉诗入手,结合相关文献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古代日本贡举制度进行简要的介绍与分析,进而探讨中日科举制度差异之原因。

一、古代日本贡举制度的起源与终结

自隋朝中日相互派遣使者以来,日本开始直接地接触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法律制度与文化风尚。645年,在消灭苏我氏的专擅势力后,倭国王更加积极地效仿中国,实施大化改新,以求建立律令制国家,加强中央集权。此后,陆续颁布《近江令》(667年)、《净御原令》(689年)、《大宝律令》(701年)、《养老律令》(718年制定,758年实施)等一系列法典,最终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古代律令制国家。其中,明确规定以贡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律令典籍,是由藤原不比、粟田真人、大倭忌寸小东人等十余人以唐《永徽令》为蓝本并参考唐永徽至开元初期的法典,于公元718年奉敕制定的《养老律令》。

所谓“贡举”,《养老令·职员令》疏曰“贡者,依令,诸国贡人;举者,若别敕令举及大学送官者,为举人。”^③此“贡举”之定义与《唐律·职制律》中疏议几乎相同,均是将贡举一词一分为二:“贡人指地方上贡到中央应考诸人,举人则指由学校出身或临时诏举而应贡举考试者”^④。根据《养老令·考课令》的规定“凡贡人,皆本部长官贡送太政官,若无长官,次官贡。其人随朝集使赴集。至日,皆引见辨官,即付式部。已经贡送,而有事故不及试者,后年听试。其大学举人,具状申太政官,与诸国贡人同试。试讫得第者,奏闻留式部;不第者,各还本色。”^⑤由此,由式部省^⑥主持每年举行一次的贡举考试制度正式在日本建立。

而后,贡举制度在日本继续平稳发展约两个世纪,其间虽经历了各个科目的调整与对应举者的身份要求等变化,但始终作为一种国家选官考试制度存在。贡举考试不仅为学生走上仕途提供了一条途径,也对古代日本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自10世纪左右,贡举制度所面临的危机

①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有关古代日本贡举制度的论文主要有:萧瑞峰《日本有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读日本汉诗献疑》,《文史知识》1995年第7期;刘乃亮《也谈日本的科举制度》,《石油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吴光辉《日本科举制的兴亡》,《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刘海峰《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向洁《科举制与日本奈良平安期贡举制之比较研究》,《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李卓、张暮辉《科举制度与日本》,《古代文明》2007年第4期;向德富、杨涛《中国科举制与日本贡举制之比较》,《长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

②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一六魏扶《贡院题》,卷七〇九徐夔《放榜日》,卷三七四孟郊《登科后》,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98页。

③ 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一《令集解1》,卷六《职员令》“摄津职条”注,临川书店1999年版,第493页。

④ 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第377页。

⑤ 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四《令集解4》,卷二十二《考课令》“贡人条”,第281—285页。

⑥ 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的中央官僚机构之一,掌管国家的礼仪、仪式庆典、选叙、考课、赐禄等事务。

逐渐显露。随着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公地公民制遭到破坏,以班田制为基础的律令制国家政治危机四伏。贵族势力重新集结,日益成为政权的主导。此种趋势持续发展,最终导致了律令制的解体。基于律令制度建立的贡举制,也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等问题,逐渐流于私学,以致出现大学“南北讲堂鞠为茂草,东西曹居而无人”^①的局面。1177年,贡举制实行的基础——大学寮毁于一场大火,此后也未予重建。中世纪以后,虽然式部省形式上仍有省试的实施,但名目已全变,成为须经权贵推荐方能参加,且几乎无条件及第的考试。真正意义上的贡举制度,终在日本历史上消失。

二、从日本汉诗看古代日本的贡举制度

日本实行贡举制的时间不长,仅有二三百年的时间,对于古代国家与后世的影响也不及古代中国、朝鲜、越南等国深远,但是,其作为日本古代国家的一种选官制度而存在的事实和意义,不应被忽视。对生存于其间的人们来说,贡举制度无疑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诸多影响;尤其是对于及第后走上仕途的学子,参加贡举考试甚至可视为改变其一生的重大事件。由此而言,时人所写关于贡举制的诗文,是记录了日本贡举制度实施状况与影响的最为直接、鲜活的资料。以下,笔者拟从这一类汉诗入手,试对古代日本贡举制度的若干特点加以分析。

(一) “况为进士扬名后,今待公卿采择恩”——日本贡举之科目设置

此句选自《菅家文章》卷二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之一《贺和明》,其诗云“此是功臣代代孙,神明又可佑家门。况为进士扬名后,今待公卿采择恩。”首先,这组绝句的名称为“贺诸进士及第”,首提“进士”一词;其次,在诗文中又提及“进士扬名”一事,点出“进士”之科名。若仅看前者,也许会有所怀疑,认为此处所指之“进士”可能并非专门一科,而如中国古代“秀才”一词后来的意义变迁一般,是泛指应试举子或一般读书人的代称。然而,思及后者,此疑虑即可迎刃而解,若“进士”一词并非专指一科,而泛指普通读书人,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因“为进士”而“扬名”的现象。故笔者认为,上引诗句可以说明,在古代日本贡举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着“进士”一项科名。

从古代日本的其他文献中,亦可证实这一点。日本贡举制度的起源,可追述至《大宝令》。《令集解》卷十七《选叙令》“两应出身条”引《古记》云“两应出身,谓父荫、祖荫、秀才、明经、进士等,从高叙者。”由此可知,贡举科目至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三科。虽然同条在《令义解》的注解中,仅列“秀才、明经……之类也”,未明言“进士”一科,但据台湾学者高明士所解,此应是日本仿照中国《唐律疏议》中列举之故,不成为反证。^②加之,在标志着日本贡举制度正式确立的《养老令》之《选叙令》、《考课令》与《学令》中,亦明确以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作为贡举的主要科目。至此,“进士”作为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中的一科应确定无疑了。

同时,对于上文言及的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日制与唐制规定虽有少许差异,但整体内容极为接近,明显是日本方面仿照唐朝律令进行设定。除此四科外,日本方面亦有特殊之科目设定,即医、针二科。《养老令·医疾令》规定,“医、针生业成送官者,式部复试,各二十条。”《令义解》注云:

①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27卷《本朝文粹》卷二“意见十二虹”条,大曾根章介、金原理、后藤召雄校注,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152页。

② 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第380页。

“谓宫内申官,官下式部。此宫内先已校(原文如此,他本作“校”——引者注)练,故云复试也。”^①据此可知,医、针二科之学生入仕,实与大学寮学生相同,均遵循先贡送至太政官再由式部省进行考试的国家考试程序。在唐朝的相关规定中,未见与此制相同或相似者。由此,高明士认为“将医、针列为贡举科目,若非为《六典》的脱漏,当是日本的新意。”^②可见,古代日本在仿照中国建立贡举制度之时,不仅继承了唐朝已有的科目体系,也不乏自己的创新。

(二)“四十二年初及第,应知大器晚成人”——日本贡举之难易与各科目间之消长

与古代中国相似,日本学人在贡举考试中第后所作的诗文中,往往会回顾自己为了考试及第所做出的皓首穷经般的努力,以及屡试不中的困顿与艰辛。本节标题所引诗句同样出自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之中,名曰《贺橘风》。另外,《贺和平》之“不遗白首空归恨,请见愁眉一旦开”,以及《扶桑集》中所载菅原淳茂《对策及第后伊州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之“穷途泣血几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等,也均为及第后回首过去艰难的感慨诗作。从这些诗作中可看出两点:一是日本贡举考试及第较难,二是日本贡举考试进士科及第有一定难度。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可以从诗文作者方面来考察。上举最后一首诗的作者菅原淳茂,实为菅原道真之子。其曾祖菅原清公,公元798年以“弱冠奉试,补文章生,学业优长,举秀才”^③,终为从三位之高官。其父菅原道真,在870年经式部省方略试中合格,历经擢拔,官至右大臣,且有于883年掌管贡举考试之经历。生于如此豪门的菅原淳茂,受其家学影响,当在文章、方略上亦有不逊于旁人之能力,却仍需经“穷途泣血几兼秋”的努力方可中第,可见贡举及第之不易。另外,从文献方面考察亦有相关佐证:802年,太政官奏云“建法(指《大宝令》)以降,殆向百岁,二色(秀才、明经)出身,未及数十。”^④就是说,在贡举考试开始后的近百年间,二科及第者不过凤毛麟角,其竞争之胜、及第之难,则可以想见。

至于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中进士科与其他科目之难易,该问题又与日本古代贡举制度中各科目间的消长状况密切相关。在中国唐朝,科举制实行的结果是秀才科逐渐停废,而进士科日渐兴盛,此与唐朝秀才科应试过难及第者少,以及时人对于“一品白衫”之追求有关;而在日本,尤其是公元730年以后,则是秀才科逐渐独盛,而进士及其余科目衰落。因此笔者以为,要讨论进士科与其他科目之难易问题,宜将进士科与秀才科作为主要对象进行考察。

在古代日本贡举进士科与秀才科的难易程度的问题上,学者间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按令制规定,进士科主考时务策,秀才科主考方略策。《令集解·考课令》“秀才条”注引《古记》云“秀才,谓文章士也。方略,谓无端大事也。……假令,试问云‘何故周代圣多,殷时览小?’”;“进士条”注云:“时务,谓治国之要道耳。《吕氏春秋》,一时之务是。假如‘使无盗贼,其术如何’之类。”^⑤对此,高明士、刘乃亮等学者认为,秀才科是“最为难考的科目”^⑥,士子为显示自己的才学,争相竞考,终使其成为“士子竞试之鹄”^⑦。相反,刘海峰则认为,进士难而秀才易,正是由于“人们趋易避难,导致二科

① 黑板胜美编《国史大系》第22卷《令义解》卷九《医疾令》“医针生选叙条”并注,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82页。

② 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第381页。

③ 黑板胜美编《国史大系》第3卷《续日本后纪》卷一二“承和九年十月丁丑”,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146页。

④ 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三《令集解3》卷十七《选叙令》“秀才出身条”注引,第419页。

⑤ 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四《令集解4》卷二十二《考课令》“秀才条”注引,“进士条”注,第269、274页。

⑥ 刘乃亮《也谈日本的科举制度》,《石油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⑦ 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第390页。

的升沉消长”^①。在没有直接史料的情况下,我们难以论证双方的观点孰对孰错。^②但是笔者认为,双方都提出了难易程度对于贡举科目发展之影响的问题,并力图做出较为合理的分析,使得两种意见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证明进士科与秀才科难易程度确对两科的发展状况有所影响。

诚然,仅从难易程度这一个角度,并不足以阐明秀才科最终走向独盛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此种局面的产生,亦与秀才科本身之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秀才科具有文学性特点。虽然在令制之上,日本方面对该科及第者的要求几与唐朝相同,均为选取“博学高才者”^③,表面似无对于文学性的特殊要求。但是,受当时的文化潮流的影响,即日本圣武天皇以来频频行幸与宴飨,急需养成宫廷诗人与提高汉文学教养;以及时人仰慕唐朝文风,竞习唐文;加之菅原清公等重臣之推动,终使贡举制度亦渐趋文学化。公元728年,中央官学大学寮中专设名为“文章”之一道,训练汉文学与诗赋之人才;730年,又专置“文章得业生”,“拟二科(秀才、进士)之贡举”^④,让这些长于文学的人才参与到贡举之中。且《令集解·学令》中又有“凡学生虽讲说不长,而闲于文藻,才堪秀才、进士者,亦听举送”^⑤之规定,也鼓励富于文采者参与秀才科的贡举。由此,秀才科在当时文化潮流的影响下产生出注重文学性的趋势;且正因其重视文学性的特点符合了崇尚文风的文化潮流,又促进了秀才科在日本古代教育体系中进一步发展。

日本贡举制秀才科的第二个特点,则是其随历史发展逐渐显现出学生生源的贵族化倾向。在贡举制实施的早期,秀才科之地位似乎并不如明经科。仅以大学寮对于入学学生的要求来看,相比于主科明经道学生“五位以上子孙”、“东西史部子”、“八位以上子”以及“国学生通二经者”^⑥的要求,日后与秀才科联系紧密的文章道取自“杂位及白丁”的要求显然过低。陈水逢认为,这是由于奈良时代一般贵族均注重明经道而造成的结果。^⑦而及至平安时代,随着贵族向往唐朝文风的趋向日盛,文章生的地位与要求被显著提高。827年中纳言安世良峰所奏《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云》中称“太政官去十一年十五日符称:案唐式,照文、崇文两馆学生,取三品已上子孙,不选凡流。今须文章生者取良家子弟,寮试诗若赋补之。……偏据符文,似谓三品已上。纵果如符文,有妨学道。何者?大学尚才之处,养贤之地也。天下之俊咸来,海内之英并粹。游夏之徒,元非卿相之子;扬马之辈,出自寒素之门。高才未必贵种,贵种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唯才是贵。”^⑧虽然安世良峰上奏的目的是为阐发“高才未必贵种,贵种未必高才”的观点,希望朝廷取消文章生的身份限制,唯才是举。但该奏文也反证出此时文章生之身份,即参加秀才科贡举的主要人员之身份,已经趋向贵族化。至此,集学子所趋之难易程度,朝廷所尚之文学性特点,以及势族所崇之贵族化特征的秀才科,便逐渐发展成为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下最为兴盛的一个科目。

①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367页。

② 关于此问题,持前一观点的学者往往以《本朝文粹》中所载安世良峰之牒状“依令,有秀才、进士二科,课试之法,难易不同。所以元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之贡举”这一段史料作为佐证。但笔者认为,该史料仅言及二科难易有别,要求学生按学力分科应举之问题,难以直接得出“秀才难于进士”的结论。同样,笔者所引“四十二年初及第”等诗句,也无法证明进士科目难于秀才科。故在没有其他更为直接的史料佐证的情况下,对此问题存疑。

③ 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三《令集解3》卷十七《选叙令》“秀才进士条”,第414页。

④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27卷《本朝文粹》卷二“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第145页。

⑤ 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三《令集解3》卷十五《学令》“讲说不长条”,第247—248页。

⑥ 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三《令集解3》卷十五《学令》“大学生条”,第214—216页。

⑦ 陈水逢《中国文化之东渐与唐代政教对日本王朝时代的影响》,中国国家图书馆蓝印本1966年版,第886页。

⑧ 《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27卷《本朝文粹》卷二“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第145页。

(三) “登科两字千金值,孝养何愁无斗储”——日本贡举应举者之身份

日本汉诗《贺野达》诗云“亲老在家七十余,每看膝下泪涟如。登科两字千金值,孝养何愁无斗储。”此诗中前两句,描写诗文作者家中老人孩子俱在,但心情难以愉悦的状况;后两句笔锋一转,言及贡举登科之事,说明登科后则不会对家人的孝养产生忧虑与烦愁。至此可以明晰,诗作者之所以“泪涟如”,是因为家中“无斗储”的缘故。而这种家中“无斗储”之人,亦可参加贡举并及第的事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古代日本贡举,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存在着身份家世较低者及第的事例。

事实上,根据日本的文献记载与相关统计研究,古代日本在法律上对于参加贡举者的身份限制较为严格,但仍为身份家世较低者提供了一些机会。日本贡举制度中不存在如中国方面“怀牒自举”的方式,因此日本中央举人几乎全为中央官学之学生,地方贡人主要来源于地方国学或是大宰府学的学生,贡举制度几乎完全依托于日本古代学校制度而成立。碍于身份限制无法进入中央学校的学子,可以先进入地方国学校,在学九年之内达到通二经以上的标准后,申送式部省,经考试后补为大学生或授予位阶。^①此即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所谓“庶民进入中央官界的唯一途径”^②。这“唯一途径”为日本古代的养士与选士制度在身份限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不过终究没能有较为显著的发展,反而愈加衰落。《类聚府宣抄》卷九《方略试》承平五(935)年“八月二十五日”条云“谨检案内,我朝献策者,始自庆云之年(704—707年)。至于承平之日,都卢六十五人。元庆(877—885年)以前数十人,多是名其家者也。宽平(889—898年)以后,只有儒后儒孙相承父祖之业,不易门风偶攀仙桂者,不过四五人而已。”^③这一记载最直观地反映了古代日本贡举应试者身份分布之变化。

日本贡举制度的确立是在公元8世纪之时,在其成立之初,曾为实现统治者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设想做出过努力。但到了9世纪,受贵族势力日盛之影响,该制度就与中国唐朝之逐渐崇尚公平的选官制度背道而驰了。在《菅家文草》中,另收录有一首菅原道真所作古调《博士难》,其中几句颇具深意:“我为博士岁,堂构幸经营。万人皆竞贺,慈父独相惊。相惊何以故,曰悲汝孤茕。博士官非贱,博士禄非轻。吾先经此职,慎之畏人情。”在旁人看来,菅原道真成为受人尊敬且俸禄优厚的官学博士,实是令人艳羡之事,但其父道出了“畏人情”的担忧。可见,在当时的中央官学,人情世故、贵族势力就已对博士的公平性产生了影响。尽管菅原道真在后文中表明自己“教授我无失,选举我有平”的态度与做法,但难以否认,当时很可能有不甚公平之现象存在。中央官学尚且如此,处于地方势力掌控之下的国学则更有可能出现贡送不公平的现象。这一切都为日后日本贡举制逐渐流于形式埋下了祸根。

及至10世纪以后,古代日本贡举制度的根基——大学寮教育更是逐渐被有势力的贵族所掌控。一方面学官世袭。大学的主要科目——纪传、明经、明法和算道等四道的课程由不同家系的学官讲授,^④而教授之职也是由这些学官家系世代掌握。^⑤另一方面,在大学寮内,藤原氏、橘氏和在原氏等大氏族相继设立了名为“劝学院”、“奖学院”与“学官院”的“别曹”。这种不受大学寮管辖的特殊氏族学舍

① 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三《令集解3》卷十五《学令》“通二经条”,第244—247页。

② 多贺秋五郎《唐代教育史的研究——日本学校教育的源流》,不昧堂1953年版,第155页。

③ 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第394页。

④ 纪传道,主要教授《史记》、《汉书》、《文选》等史书与诗文,培养史学人才。明经道,主要教授《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明法道,主要讲授律令,培养法律人才。算道,主要使用《九章》、《海岛》、《周髀》、《五曹》、《九司》、《孙子》、《三开重差》等教科书,培养算术人才。

⑤ 纪传道的学官称作纪传博士,此职由菅原氏、大江氏、藤原南家、藤原式家、日野家等氏族世袭。明经道的学官称为明经博士,由中原氏、清原氏世袭。明法道的学官为明法博士,由坂上氏、中原氏世袭。算道的学官称为算博士,小槻氏、三善氏世袭。

的设置,不仅为贵族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更增强了有势力的贵族在大学寮中的势力,使官学逐渐流于私学性质。加之在 913 年的学制改革和律令国家颁布的《延喜式》中,又规定只有得业生才能参加国家任官考试,^①更增加了庶族子弟进入仕途的难度与复杂程度。朝廷不得不对贵族妥协,终使古代日本的贡举制度丧失其公平选拔人才之初衷而流于形式。

(四)“龙门此日平三尺,努力前途万仞强”——日本贡举及第者之叙位授阶

日本汉诗中有《贺田饶》一首,诗云“人共贺君我独伤,曾知对策苦风霜。龙门此日平三尺,努力前途万仞强。”诗的前两句描绘了诗作者在与他人共贺及第之时,因回想起为对策而苦经风霜以致独自哀伤的情景。正如上文所提及,学子在及第之时,往往会感叹之前的困顿与艰辛,此种表现亦可成为日本贡举及第之难的又一佐证。后两句中,作者回到现实,提到“龙门”、“前途”等字眼,将贡举考试与及第后的叙位授阶问题联系起来。

关于贡举及第之法,日制主要仿自中国唐制。比较日本令制与唐制,可知贡举诸科登第后的叙位,秀才、明法两科皆同,明经、进士两科略有差异。

日本贡举制中,明经科上上等级授正八位下,唐制为从八品上;进士科甲等授从八位下,乙等授大初位上,唐制进士科甲等为从九品上,乙等为从九品下。^②可见,日本方面明经、进士两科的叙位均高于唐制一阶。其原因目前尚不明了,可能是立法之初,日本方面已经预见明经、进士两科较难,所以设定高于唐制一阶来诱使士子报考,^③然而,两科之授阶终低于秀才科。其后,随着秀才科的独盛,这一提高授阶政策并未阻止明经、进士等科衰落,未能达到所预期的效果。

至于贡举及第后的加阶,日唐两方也有些许差异。日本《养老令·选叙令》规定如下:“其秀才明经得上中已上,有荫。及孝悌被表显者,加本荫本第一阶叙。其明经通二经以外,每一经通加一等”^④“凡两应出身者,从高叙。”^⑤唐朝《唐六典》云“若本荫高者,秀才明经上第,加本荫四阶,已下递降一等。明经通二经已上,每一经加一阶,及官人通经者,后叙加阶亦如之。凡孝义旌表门闾者,出身从九品上叙。”^⑥比较日唐双方的规定,最明显的差别有两点,其一是唐朝方面对于受表扬的孝义者,直接授予出身;而日方则是“秀才明经得上中已上”者才考虑因孝悌方面突出而加阶。这是唐朝方面将孝义置于出身之前;而日方将孝悌至于出身之后的表现,多少可以看出日方对于出身的重视比唐方更甚。其二是唐方有官人通经则加阶的规定,而日方无。表明唐朝方面对于官员之再学习、再生产更为重视;日方则可能是由于与唐相比较为后进,未意识到此点。不过,在其后宝龟二年(771年)的天皇敕命中又规定,“自今以后,有位见试以及第者,同阶以上加一等叙之”^⑦。这是仿照唐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除此之外,关于古代日本贡举制下及第者的叙位授官,还有两点值得说明。第一,学子通过贡举

① 姜亚沙编辑《日本史料汇编(三)》《日本纪略》卷一“延喜十三年五月四日”条,中国国家图书馆影印本 2004 年版,第 104 页。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十五《延喜式 4》卷二十“大学寮”式,临川书店 2000 年版,第 107 页。

②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条注,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32 页。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三《令集解 3》卷十七《选叙令》“秀才出身条”,第 420—421 页。

③ 高明士《日本没有实施过科举吗》,《玄奘人文学报》2004 年第 3 期。

④ 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三《令集解 3》卷十七《选叙令》“秀才出身条”,第 421、427 页。

⑤ 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三《令集解 3》卷十七《选叙令》“两应出身条”,第 429—430 页。

⑥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条注,第 32 页。

⑦ 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三《令集解 3》卷十七《选叙令》“秀才出身条”注,第 423 页。

及第,所授官位并不高。依上引文献所载,其官位基本处于正八位至大初位之间,此较中国唐朝及第授阶为高,但远低于日本古代另一种重要的入仕途径——荫位制。和后者的授阶无须苦读,仅凭家世即可得到从五位下至正八位下位阶的情况相比较,^①凭借贡举及第者入仕官位起点低,入仕之路亦尤为艰难。第二,贡举制终非古代日本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据台湾学者毛汉光统计,唐朝士人入仕,通过贡举及第的占33.90%,经荫附得官的占28.40%^②,贡举占有重要地位。反观日本,则是荫位、舍人二制为主流,实际由贡举出身者少。^③9世纪之际,日本一度实行强制贵族入学的措施,贡举更成为贵族子弟接受荫位前的一个“跳板”,削弱了其作为独立选官制度的职能。这可能也是有的国内学者将日本古代贡举制度定性为荫位制之附庸制度的原因。^④

综上所述,在古代日本,的确曾在较短时期内实行过贡举制度。在开科方面,除学习中国唐朝的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个基础科目外,另设医、针二科成为其特色。在及第难易与各科消长方面,日本贡举及第较难,秀才科受到其难易程度与自身特点的影响,终成为诸科中最为兴盛的一科。在应举者身份方面,日本贡举依托于学校体制,对应举人员的身份要求较为严格,且随时间推移有愈发严格的趋势。在及第者叙位授阶方面,日本主仿唐制,但与荫位制等授官方式相比,贡举及第者所授位阶及其在国家官吏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前者,最终导致贡举制未能成为日本古代选官方式的主流。

三、日本贡举制度与中国科举制度差别之原因

萧瑞峰与刘乃亮曾通过比较日本贡举制与唐朝科举制,讨论了两者的差异问题,得出几乎相反的结论。^⑤在笔者看来,两人对日本贡举制与唐制差异的不同理解,仅缘于对文献的主观认识不同,双方并未提出客观且一致的判断标准。

应当指出,日本贡举制在成立之初就与唐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逐渐增大,终走上与中国科举制度截然不同的道路。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日两国实施这一制度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不同。

(一) 政治上,古代日本与中国的政治集权程度有所差异

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以来,开始建设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皇权至上的思想逐步确立并渐趋成熟。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出现地方豪族蜂起,中央集权受到威胁的局面,但及至隋王朝,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再度得到发展和加强。此后,统治者更谋求进一步打破门阀界限,削弱氏族的势力。身分限制较弱的科举制度正迎合了这一政治要求。于是,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一经确立,就受到了专制统治者的支持,带有了强大的历史惯性,以至形成“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却不可不开”^⑥的状况,最终伴随着封建制度走向衰亡。

① 虎尾俊哉等编《贵重典籍丛书》历史篇卷三《令集解3》卷十七《选叙令》“五位以上子条”并注,第451—453页。

② 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的社会变动》,政治大学1968年版,第122、123页。

③ 野村忠夫《律令政治与官人制》,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第574页。

④ 邵峰《日、唐律令官人制度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2008年第4期。

⑤ 萧瑞峰在《日本有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读日本汉诗献疑》一文中认为,日本贡举科目少,人员身份要求高,“与中国唐代的科举有很大不同”。刘乃亮在《也谈日本的科举制度》一文中认为,日本科举与唐朝相比,在科目、内容、录取标准和难考科目等方面都差别不大,得出“两者并无多大差别”的结论。

⑥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98页。

反观日本,历史背景与条件则大有不同。自大和时代起,日本就具有强大的贵族传统。随着氏姓制度的确立,伴造系的氏族与中央氏族构成了大和王权的主要内容,贵族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虽然其后大化改新时期,倭国王也努力学习中国的律令制度以加强中央集权,力图削弱传统的地方贵族势力,但实际结果只是让一批新贵族取代了旧贵族,中央集权的律令政治体制仍旧难以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天皇权威和律令政治建立起来的选士制度——贡举制,只能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文化遗产与教育普及的功能,始终徘徊在政治体制的边缘。且随着10世纪以后贵族政治的成熟,原本希望打破身份界限、靠能力选取人才的贡举制度,终在政治方面的高压之下逐渐流于形式,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般地归于消亡。

(二) 经济上,古代日本与中国影响选士制度的经济因素有所差异

如上文所述,古代中国科举与学校的发展渐行渐远。与之不同,古代日本的贡举制度与学校联系紧密。由此,在经济上,相异于中国的科举制度仅受政府财政支持程度的影响,古代日本贡举制度的实施,不仅有赖于政府对其本身的财政支持,还与日本古代学校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据日本文献记载,日本中央学校之经费,包括校舍修缮、学官俸禄以及学生的衣、食、住等方面的花销,主要由国家供给;而国家财政又主要来源于各地上缴的地租、赋税以及民部省经营官田的收入等。地方学校的经费,则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地租收入,以“出举稻”的方式进行供给。^①于是,古代日本的贡举制度就与大化改新后的主要土地制度——班田制联系在一起。在班田制较为稳定的奈良时期,日本古代的学校制度与贡举制度还能正常地维持运转。但进入平安时代以后,随着贵族势力日强,他们与大寺院等极力吞并土地,据为私有,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免于中央税收的“庄园”,直接导致了政府收入的减少,学校与贡举所用经费也必然受到影响。加之依靠庄园经济发展起来的贵族之政治力量的逐渐上升,贵族之家的子弟即使不进入学校,依然能得到高位高官,学校也就失去了其养士的意义。由此,班田制的崩溃,对于古代日本的整个律令制度,特别是与直接行政无关的学校,影响极为明显。^②紧紧依附于此的贡举制度,在学校衰落的同时,自身经费又难以得到保证,终无奈地流于形式化。

(三) 文化上,古代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有所差异

一方面,中日双方中央官学的发展路径不同。在古代中国,随着统一王朝的建立,统治阶级往往产生确立统一意识形态的需要。反映到学术上,即正统学术思想的确立,具体表现为对于中央官学教科书版本之逐渐严格的要求。这些统一的教科书直接为中央学校与科举制度设立了学术上的正统标准,使二者长久地延续下来。反观古代日本,虽然在学校与贡举制度建立之初,也曾尝试确立统一的教科书;但进入平安时代以后,随着贵族势力渐强,出现了学官世袭,各道博士“据为牙城,不涉他家之学”,甚至是“更以相轻,短长在国,亦弟子亦门,互有纷争”^③的现象。此“家学”之产生,不仅使学校失去了正统学术的权威地位,也导致基于学校制度建立的日本贡举制,逐渐流于私学性质。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出现转型的趋势。古代日本基于自身相对后进性以及对于中国先进文明的仰慕,在大化改新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如饥似渴地学习与吸收中国文明。贡举制度在此时期爱屋及乌

① 黑板胜美编《国史大系》第26卷《弘仁式》卷二十六“主税”条,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56页。所谓“出举稻”,指用稻谷放债。一般在春夏两季分两次借与,秋季加利息收回。有国家之放债“公出举”与寺院、贵族之放债“私出举”两种主要形式。日本贡举制度建立后,国家或地方用放债中得到的利息来支付学校经费。

② 多贺秋五郎《唐代教育史的研究——日本学校教育的源流》,第155页。

③ 陈水逢《中国文化之东渐与唐代政教对日本王朝时代的影响》,第898页。

地受到一定的重视,也是颇为自然之事。然而,到了平安时代中后期,日本文化开始转向。10世纪以后,假名文字、和歌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贵族文章中也出现了和风的色彩,“国风文化”渐趋形成。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受到当时唐朝势力衰微、遣唐使停派等的影响,日本减轻了对中国文化的學習热情。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全面学习唐朝的几个世纪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终使日本文化走向独立。因此,虽然包括科举制在内的中国文化制度,不可否认地为日本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此后,随着日本文化的成长,汉唐文化在日本的影响渐趋减弱,与此紧密联系的贡举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发展变质。

综上所述,古代日本的贡举制度,在政治上,根植于天皇中心的日本古代律令制度,随着贵族政治势力的强化而变质;在经济上,与学校制度紧密相连并在班田制的基础上建立,随着后者的瓦解而消亡;在文化上,则是倚仗古代日本对于唐风之崇拜而受到重视,但又随着“家学”的兴盛和“国风文化”的产生而渐趋衰落。源自古代中国的贡举制度,终于在古代日本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与条件的作用下,“橘逾淮而为枳”,与中国的科举制度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并终因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通过上文的考察与分析,不难发现,尽管古代日本的贡举制度基本上全盘仿照中国唐朝的科举制度,但无论是在其建立之初还是之后的发展历程中,都有着自身的特点,正是日本国内的具体国情导致了该制度的消长与转变。其实,这不仅是古代日本贡举制度演变的特点,也是日本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对于日本贡举制度的意义与影响,学界的评价往往趋于消极。比如,在今天的教科书中,对比中日两国何以在近代走上不同发展道路时,往往将产生于古代的中国科举制度列为影响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之一。李卓、张暮辉也曾指出,日本正是在脱离了贡举制度之后,才发展出实用主义教育并形成了尚武精神。^①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制度,贡举制对日本来说也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与积极的意义。可以说,日本贡举制的实施为古代日本全面引进唐代文化提供了某种制度的保证。仅短暂存在过的日本贡举制度对日本历史的影响也许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没有贡举制实施期间的文化积淀,日本平安时代以后的“国风文化”也不可能顺利地诞生。

[本文作者崔晓,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责任编辑:马新民)

^① 李卓、张暮辉《科举制度与日本》,《古代文明》2007年第4期。

Xie Guorong ,*Activ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Women for the Prevention of Lynching and its Effect in the 1930s*

In November 1930, a small group of southern white women leaders from middle class answered Jessie Daniel Ames's call to establish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Women for the Prevention of Lynching (ASWPL) in Atlanta. The organization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against lynching, leaving the field of political action to other groups. It repudiated the claim that lynching is necessa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hite women, and created a new climate of public opinion by challeng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acial violence and sexual attitudes. ASWPL's campaign led to the reduction of lynching in the South. They had greatly affected the South's whole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race relations, and made NAACP change its emphasis from anti-lynching to anti-separate education in public schools. These women were lesser-known faces in US civil rights activities. However, they had improved race relations in the South and women's public image and their importance of social reform in the American society. In fact, they not only pioneered the way for racial equality but also for gender equality.

Xu Shanwei ,*The Living Expenses and Tuitions of Medieval European University Students*

Nowaday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life, and what I discuss in this pap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it. The total cos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each item of main expenses in the total costs of a medieval European university student are estimated in this paper. Generally in the Medieval European universities, accommodation costs, the costs on receiving the degree, and class fe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in the total costs. Compared with modern university students, they didn't need to pay for the high registration fee at that time. Students of different times, different regions, different faculties, and different social stratum cost differently. University fees were usual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order to ensure a relatively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erefore, the poor students could enter universities not by adjusting the fees, but through the reduction or exemption of parts of the costs and complete their education. But on the whol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in Europe,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was expensive, most students were just children from rich families.

Cui Xiao ,*Viewing the 'Gong Ju' System in Ancient Japan from Japanese Chinese Poetr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and selecting talented person in ancient China, which has always been of concern for scholars. There are many discussions about its definition, content,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These researches have even developed into a specialized knowledge.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cient Japanese also instituted a similar examination system, which is called 'Gong Ju' system. Although its

implementing time and received attention is far less than the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t still has the special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hinese poetry in that time to research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ng Ju' system. An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history background and condition, the ancient Japanese 'Gong Ju' system and the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finally took different roads.

Guo Honggeng, *The Raksu Soldiers of the Assyrian Empire*

The type of soldiers denoted by raksu were the crack soldiers of the king's squad of guards headed by the chief eunuch. They were composed of the people from the conquered territories, and were characterized by being exempted from taxes and civilian services. In the ni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 C. , the king's authority was despised by some powerful officials. The kings held their royal throne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hief eunuch and his squad of guards. The kings rewarded their loyal services by promoting the chief eunuch and exempting the distinguished soldiers from taxes and civilian services, and the raksu soldiers emerged right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With the incorporation of captives in a large number, the king's squad of guards became the standing army of the Assyrian Empire, and they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well in the expansion campaigns. The kings rewarded their outstanding soldiers by relieving their taxes and services, and the raksu soldiers rose occasionally. In the last days of the Assyrian empire, the powerful chief eunuch coveted king's throne, and the troops in his command, possibly including some raksu soldiers, might be his accomplices. The rise of raksu soldiers and the alienation of their roles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change of the Assyrian politics.

Chen Ying, "Allying with Demos": *The Alcmeonids and the Foundation of Athenian Democracy*

The Alcmeonids is an aristocratic family that i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politics and power. It had been exiled many times but succeeded to regain authority every time; its family member had competed with the tyrant, but one of them became the archon in the tyrant's government; the family had supported the democratic reform, but kept its aristocratic ideal all the time. The family's conflict with other genos has deeply affected the Athenian politics in the archaic tim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Alcmeonids in the sixth century BC. My intension is that, the polit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Alcmeonids and other familie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Athenian citizenship; the aristocratic power struggle and the civic consciousness both contributed to the foundation of Athenian democracy.